

新观察

来自青藏高原的吟唱

——甘南诗群素描

安少龙

“地方诗群”是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地域”作为诗人创作的源泉,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本土诗学资源,构成当代中国诗歌的本土性和多元色彩。甘南诗群是甘肃地区诗歌群落中影响较大、辨识度较高的诗群之一。甘南诗群的壮大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与诗人群体的代际影响,其诗歌成就得益于诗人有意识的自我突破与个体诗学探索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地理空间为标志的诗人集群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中,“地方诗群”成为堪称壮阔的景观。新世纪以来,不少以“地名”集结的诗歌群落逐渐被行政地理学意义上的“某省”“某市”诗群所取代,并汇集为当代主流诗歌的各条支流。而“民间”的大多数诗歌群落则整体迁移到了网络文学空间,在网络世界里,诗歌的“民间性”和“地方性”似乎有必要重新定义(当然,由诗派和民间集结而成的“民间”与由地理空间形成的“地方”并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诗群”的衰落。虽然一批当代中国诗人已经走出了“地域”,进入了“世界”场域,与世界诗歌展开了对话,但同时,更多的诗人依然依托地域,以“诗群”的合力彰显出诗歌的地方性存在。

“地域”作为诗人创作的源泉,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本土诗学资源,构成当代中国诗歌的本土性和多元色彩。只要作为人类群居结构单元的“地方”还存在,那么“地方诗群”的存在,必将是一个长久的现象。那些分布在广袤的边地、特别是西部或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人群落,在全球化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异彩纷呈、群星闪耀,可以从甘肃诗歌的发展状况中得到印证。

甘肃有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省内各地地理、风俗差异很大,给诗歌提供了多种养分,因此新时期以来就形成了兰州诗群、河西诗群、陇东、陇中、陇南诗群、甘南诗群等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诗群,它们以整体的规模效应支撑起了甘肃作为诗歌大省的创作体量。各个诗群的作品既有共性,也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各个诗群中陆续走出了一批代表性诗人,如丹真贡布、林染、何来、李老乡、阳飏、人邻、叶舟、娜夜、牛庆国、阿信、古马、李志勇、扎西才让、梁积林等,他们既彰显了地方“诗群”存在的意义,反过来也对“诗群”的发展产生了引领示范效应。目前,“地方性”和“群落化”依然是甘肃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

甘南诗群是其中影响较大,辨识度较高的诗群之一。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肃西南部,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草原辽阔、群山逶迤、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多样化的自然生态奇观,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并存,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交融,使得甘南成为诗神所青睐的一方净土。尽管地理位置的偏远,使得甘南诗歌和新时期文学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诗歌中心有一定距离,但甘南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给予甘南诗歌一片在雪域高原上安静、自足生长的沃土,形成地方性写作的诗歌现象。如果以甘南诗群作为考察地方诗群的一个典型样本,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参考。

地域文化的滋养与诗人群体的代际影响

甘南诗群的壮大,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与诗人群体的代际影响。纵向来看,新时期以来的甘南诗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的群体,姑且可以称之为四代诗人:

第一代是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诗人,以藏族诗人丹真贡布、贡卜扎西、白华英、尕藏才旦等为代表。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知识分子,也是甘南新时期诗歌的开拓者。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诗人,其中的代表诗人有完玛央金、桑子、阿信等,他们是引领甘南诗歌向当代转型的最重要一代诗人。第三代主要是出生于70年代及以后的一批诗人,其中的代表诗人有李志勇、扎西才让、牧风、敏彦文、瘦水、阿刚、刚杰·索木东、王小忠、唐亚琼、花盛、王力等,这一代诗人构成新世纪以来甘南诗歌最具活力和冲击力的创作群体。第四代是一批出生在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他们在新世纪初开始诗歌创作,并异军突起,成为甘南诗歌的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其中的代表诗人有嘎代才让、沙冒智化、诺布朗杰、斯琴卓玛等。而从个别崭露头角的“00后”诗人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展望第五代诗人的出场。

根据代际划分,我们可以看到甘南诗群不同时期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同质”却“不同型”的样貌。“同质”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诗人们共有的体验方式,一种从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之中培育而成的共同的审美方式,可以称之为本土化的诗歌经验。而“不同型”是指他们的抒情风格又是多元化的,在诗歌的艺术方式上,具有代际差别。

第一代诗人作为与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藏族诗人,长期在甘南草原上的生活、工作经历,使他们的诗歌在追求与时代主旋律共鸣的同时,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体现出一些民族地域的文化元素,这使他们没有失去自己的艺术个性,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同频共振、同声同色”的时代大潮中有着比较明显的辨识度。第二代诗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并先后在甘南诗坛崭露头角。他们各自的诗歌禀赋在这一社会转型的缓冲时期和众所公认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得到了充分的激活。地域文化的滋养,加上当代诗歌思潮的涌动,包括来自西方诗歌的营养,使得这一代诗人的诗歌语汇得到全面更新,“雪山”“草地”“牧人”“寺院”“经幡”“青稞”“格桑花”“鹰”“马匹”等草原生活意象被赋予了诗性光泽,构成了一个自足、丰富的草原诗歌符号系统。经过二十年的创作实践,到新世纪初,甘南诗歌的草原意象群基本定型,成为地域文化的审美符号。可以说,这既是第二代诗人对于第一代诗人的突破,也是他们留给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财富。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大多始于世纪之交或21世纪初。由于第二代诗人阿信、桑子、完玛央金等人,基本奠定了甘南诗歌早期的意象群落、抒情方式,因此,第二代诗人留给后来诗人们的既有影响,也有压力,迫使他们在模仿与追随中艰难地寻找突破。以“70后”诗人为中坚力量的第三代诗人由此成为一批在甘南诗坛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诗人。他们扎根甘南本土文化,传承了丹真贡布、贡卜扎西等老一代诗人奠定的甘南本土诗歌传统,尤其承袭了其中深沉的国家、民族情怀与炽热的故土情结,又接续着阿信、桑子、完玛央金等诗人所走出的诗歌的先锋路径,同时接受着当代诗歌的平行影响,在题材和形式上不断自我突破,走出了一条越来越趋向现代化的诗歌道路。扎西才让、牧风、刚杰·索木东、阿刚、花盛等一批诗人都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和影响力。第二代甘南青年诗人的“集群出击”也值得注意,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各大诗刊上以“方阵”的形式亮相,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在诗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诗人如嘎代才让、诺布朗杰、黑小白等,虽然尚未形成新的群体性诗歌力量,但他们也以各自鲜明的风格给甘南诗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在以上四代诗人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自然、民族、历史、人性、现代化等主题的分支与汇流,看到“甘南”作为一个地域的多元审美呈现,由此而初步生成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甘南”这一诗学符号。

诗人自我突破与个体诗学探索

甘南诗歌的成就,得益于诗人有意识的自我突破与个体诗学探索。歌唱母亲、歌唱故乡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对于吾乡吾土的情感表达需要。而对于诗群来说,地方诗人的追求,就是书写脚下的土地,进而通过诗歌走出本土、走向世界。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甘南诗群中产生了一批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代表诗人。

在20世纪90年代,阿信写下了大量草地诗篇,因此成为甘南最具代表性的第二代诗人。有论者指出“他的精神坐标在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原,那是他诗歌写作的地理背景和灵感源泉”。新世纪初的十余年间,阿信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诗集《阿信的诗》《草地诗篇》到《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裸原》,显示了阿信对于“甘南”地域书写的不断超越,虽然他仍然是从草地意象出发,但诗中注入了更多深刻的思考。他通过一系列深度意象建构,将关

于草原的独特经验转换为一些“人类性”的问题,构建了一种属于他个人的“草地诗学”。近作《翻石鹞》写道:“劳作就是休息。在不断的撬动中/完成繁重,体色也由栗色、白色/渐变为深黑、栗红……/劳作就是发现和攫取,啼鸣和惊喜。/——圆石是谷仓,/是海盗船底舱夹层秘密的暗格,是博物馆沉寂木门上朱红的铜钉……”诗歌通过观察一只翻石鹞在大海边翻动圆石的行为,将一种自然习性类比为生命的劳作,并将这种看上去无休止的劳作看作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又将其转换为具有东方哲学意味的体认:“劳作就是休息”“劳作就是发现和攫取,啼鸣和惊喜”。

扎西才让的早期诗歌(例如《哑冬》)具有突出的实验性质,近十年来,在将先锋手法与本土文化资源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民族化、地域化的诗歌自觉道路。近作《立秋日》写涉藏地区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通过“林卡”(一种野外餐饮与休闲场所的藏语名称)餐厅里消费者的纵情欢乐声浪和从后厨走出来的厨娘的“孱弱背影”两组意象,切入对于女性“隐忍”一生的想象,表达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某种反思。花盛的不少诗以故乡村庄为背景,通过漫游中的行吟,抒写了新世纪以来一代人在牧区与农区、故乡与城市之间不停奔波的普遍生活状态。近作《年关》写道:“在飘雪的高原,生命/像冬天一样重,也像雪花一样轻/而你我,终将被时间放马归山”,使“路上的乡愁”成为诗歌的情感生发点,为甘南诗歌的时代转型书写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经验。唐亚琼以抒写女性内在的复杂情感经验见长,早期专注于写内心的爱情感受,近年来转向抒写女性人到中年的人生况味,从乡愁、亲情、孤独等角度抒写作为女性在高原城镇的个体生存感受。诺布朗杰近作《诗是随身携带的故乡》中的“故乡”既具体又抽象,从记忆深处到纸上游移不定。在他看来,现代性已经从现实体验,转化为我们身处的生存状况,进而成为一种语言的现实。

扎西才让、花盛、唐亚琼、诺布朗杰等诗人都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用朴素的意象和情感,写出了一种交织着冷与暖、爱与恨、艰难与欢欣的日常生活状态,呈现了高原生活最本真的一面。这是对地域书写中那种常见的将本土生活异域风情化、自我审美化、刻意诗意化、抒情化模式的一种矫正,是地方诗群的一种现实主义自觉。这种诗学自觉正是地域诗歌不断自我超越的内生动力。诗人李志勇在近作《你,你,你》中写道:“你回来打开房门时还会发现,里面/你不在,你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钟表静静走动/你始终都有一个你不在的,你的世界来表示你的完整”,他在本土经验的异质化、陌生化到本土经验的升华方面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诗人阿信有着从本土化的审美经验的深度开掘,到人类经验的再本土化的艺术自觉过程。身处甘南的这两位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上为甘南诗歌的超越性发展提供了参照。

从甘南诗群的整体态势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地方诗群”在保持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在诗学追求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曾经浓郁的“地域色彩”逐渐被淡化,诗歌主题从封闭的地方性话题逐渐升华为全球性或人类性话题,诗歌艺术也逐渐卸下“乡土气”,自觉与古典诗学、西方诗学接轨。一些曾经作为“地方诗群”的代表性诗人,努力摆脱“地方诗人”的标签,与“地域性”保持了一定的疏离。这一方面说明当代诗歌对于“地域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地域性”概念的内涵本身也发生着某种由外向内的深刻变化。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从“地域”出发——笔谈

矛盾点被带着不同目的进入陷阱的众人合理化了,连小说中最容易戳穿的已知的谎言都被众人视为客观存在。若只是从“麦格芬”的悬疑设置去介入小说,小说的结局不过是意料之中的被揭穿的悬念。小说真正闪光的瞬间恰恰是众人放弃对真相追逐的动情时刻,是张公忽然发出的笑声,他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算计,“也别暴富了,我情愿你跟我们一样,底儿都耗空了,光等着投奔等着沾光哈的一个叙事陷阱摆在明面上,大大方方地布置着。但随着小说的推进,燕君暴富的真相最终成为小说追求的“麦格芬”(希区柯克最常用的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表示某人或物并不存在,但是却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它成为了一个被愚弄的理念化身,不同的人在对它的追求中自主地建立阐释的链条,组成行动逻辑。小马觉得这可能是大哥对他的忠诚的考验,于是积极地替燕君圆谎;海波则是听出了燕君暴富的“言外之意”,为了好兄弟(也为了潜在的利益)躬身入局;张公在老k的刺激下直接挑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沾老朋友光的;处于婚姻低谷期的芸女士对燕君“嘘寒问暖”。“对这个茶室与燕君的归属关系,根本没人在意或怀疑,就像谁会在意或怀疑太阳挂在天上呢!”燕君可能存在的财富成为了小说的欲望对象,而燕君的言语与现实的

矛盾点被带着不同目的进入陷阱的众人合理化了,连小说中最容易戳穿的已知的谎言都被众人视为客观存在。若只是从“麦格芬”的悬疑设置去介入小说,小说的结局不过是意料之中的被揭穿的悬念。小说真正闪光的瞬间恰恰是众人放弃对真相追逐的动情时刻,是张公忽然发出的笑声,他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算计,“也别暴富了,我情愿你跟我们一样,底儿都耗空了,光等着投奔等着沾光哈的一个叙事陷阱摆在明面上,大大方方地布置着。但随着小说的推进,燕君暴富的真相最终成为小说追求的“麦格芬”(希区柯克最常用的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表示某人或物并不存在,但是却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它成为了一个被愚弄的理念化身,不同的人在对它的追求中自主地建立阐释的链条,组成行动逻辑。小马觉得这可能是大哥对他的忠诚的考验,于是积极地替燕君圆谎;海波则是听出了燕君暴富的“言外之意”,为了好兄弟(也为了潜在的利益)躬身入局;张公在老k的刺激下直接挑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沾老朋友光的;处于婚姻低谷期的芸女士对燕君“嘘寒问暖”。“对这个茶室与燕君的归属关系,根本没人在意或怀疑,就像谁会在意或怀疑太阳挂在天上呢!”燕君可能存在的财富成为了小说的欲望对象,而燕君的言语与现实的

矛盾点被带着不同目的进入陷阱的众人合理化了,连小说中最容易戳穿的已知的谎言都被众人视为客观存在。若只是从“麦格芬”的悬疑设置去介入小说,小说的结局不过是意料之中的被揭穿的悬念。小说真正闪光的瞬间恰恰是众人放弃对真相追逐的动情时刻,是张公忽然发出的笑声,他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算计,“也别暴富了,我情愿你跟我们一样,底儿都耗空了,光等着投奔等着沾光哈的一个叙事陷阱摆在明面上,大大方方地布置着。但随着小说的推进,燕君暴富的真相最终成为小说追求的“麦格芬”(希区柯克最常用的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表示某人或物并不存在,但是却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它成为了一个被愚弄的理念化身,不同的人在对它的追求中自主地建立阐释的链条,组成行动逻辑。小马觉得这可能是大哥对他的忠诚的考验,于是积极地替燕君圆谎;海波则是听出了燕君暴富的“言外之意”,为了好兄弟(也为了潜在的利益)躬身入局;张公在老k的刺激下直接挑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沾老朋友光的;处于婚姻低谷期的芸女士对燕君“嘘寒问暖”。“对这个茶室与燕君的归属关系,根本没人在意或怀疑,就像谁会在意或怀疑太阳挂在天上呢!”燕君可能存在的财富成为了小说的欲望对象,而燕君的言语与现实的

第一感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简洁有力的话语,朴素而深刻地表达出对人生和生活的洞察。正是在平淡重复的日常和具体而微的人事中,我们才能感知并进入到更广阔的生活实境,发现并重拾人世间的良善与美好。乔叶在最新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就是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故友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和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深厚的见识。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

散文集共有四辑,“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愫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寻常事物;“我会在哪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擅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回眸只因情深。乔叶讲述母亲、阿姨、姨妈等亲人的历历往事,如烟似梦,有旧时光的静谧、踏实,也有现今的感伤、遗憾。无论是给亲人亲手做衣服的姐姐,还是嫌弃中带着亲厚的姨妈,作家的记录当下时寻常的生活场景,生动如画,素淡如诗,令人动容。“别人都在麦田里忙碌着,我们母女却聊起了天,聊天的情态宛若多年不见的好友,猛然间有些僵硬,却也很快自然起来。她有些羞涩地感叹说,她今年就要退休了:‘干了这么多年,可干够了。’我连忙安慰她,也该歇歇了。要是实在闲不住,像您水平这么高的老师,哪个民办学校不想返聘呢?这安慰是有效的。她欣然颌首,默认了我的推想。我踏实下来,方才觉出天气的炎热。”(《那么美,那么好》)梦境中母女交谈的家常美好,经由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越发显得深沉而浓烈。

“我知道,此时的我,是我。此时的我,也不是我,而是她往昔最刻骨铭心的那些事,是最隐忍、最艰难和委屈的那段岁月,是最痛美的爱情,和青春——所有的故人那里,都储存着当年的自己。”(《我就是来看看你呀》)“玫瑰园里无玫瑰,薄荷园里有薄荷。我们便在薄荷园边的长椅上静坐,闲话。东一句,西一句,叹息,感慨,欢笑,或者短暂的沉默。也说房价高低,也说柴米油盐。”(《和婉婉在台北的一天》)人到中年故友重逢,或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百感交集,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会意清淡,这些琐碎而珍贵的时刻,成为茫茫心海中的闪光点。

作家不仅对至亲好友心怀深厚的情感,还对萍水相逢的他者给予感念和铭记。微不足道的遇见,如轻风荡漾起丝丝涟漪,本该很快地消逝不见,却顽固地停留在作家内心深处,他们是具象清晰的、可亲可感的,有着朴素的人生哲学和认真生活的生命热情,其身上闪耀着的乐观善良、本真恳切的人性光华,打动了作家,也滋润着我们早已干涸的心田。烧饼店的女老板对那些干苦力的人多给一个烧饼,这让旁边的“我”在眼馋之余,更多的是难以言喻的感动和深怀的喜悦:“我羡慕这种人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高尚的怜悯、同情和理解,我在意这种不为任何功利所侵入的馈赠和关爱。”(《饼的事》)雨雾中等待的三轮车夫、投递报纸后要喊一声的邮递员、对生活知足的理发大姐、规矩中又带着些微自得的摩的师傅以及散发着清气的香樟木少年,诚实袒露内心愧怍的陌生读者……作家以细腻温润的笔触,真挚素朴的文字记录下平凡邂逅中的生活点滴、人生际遇,没有惯常的苦难叙事或励志书写,而是语淡情深地将那些匆匆而过的生命留在字里行间,揭示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背后所蕴藏的丰盈又繁富的生命景象。这是作家历经千帆后的悲悯与深情,更是“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体恤和柔软。

乔叶擅于将琐碎无奇的家常生活描绘得活色生香、温热可亲。“在一个摊上看见了香椿。主色调是嫩嫩的暗红,怎么看怎么舒服。有没有一种颜色叫香椿色?”“售卖的自然不止酱萝卜,荤菜都有,尽量丰富,酱萝卜8块钱一瓶,嘎嘣脆的酱黄瓜和韩国泡菜是9块一瓶,荤的都是喜闻乐见的品种,论斤卖的:五香猪蹄36块,猪头肉39块;论个卖的:鸭头5块,豆瓣小黄鱼12块。看着品相,闻着味道,已经忍不住想去扫码。”(《小日子》)在舒缓却不失情味的叙述中,不论是路摊的热闹还是超市的琳琅,不论是一捆洪山菜薹还是一把指甲花籽,不论是楼下悠悠的馥郁桂香,还是郊区丛丛的清凉薄荷,即使是微不察觉、毫无诗意的价目表也变得可爱起来。作家心细如发,总能敏锐捕捉到细微的生活缝隙中浸润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它如此日常,又如此脱俗。

人类学家项飙曾以“附近的消失”描述青年焦虑、失序、悬浮的生活状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愿意关注远方的事物,而忽略身边具体的人物、草木和故事,遥远的物理距离因网络缩短,造成“附近”在日常生活中的退出,由此同情与理解变得稀缺,信任与亲密关系不断丧失。《要爱具体的人》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在于从“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开始,发现“附近”,在与周边世界和陌生人产生连接的过程中,构建起生机、美好、丰饶的现实人生。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鼓励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的平淡和琐碎,这也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与楼下小超市老板的闲聊,去菜市场感受弥漫的烟火气,或许更能带来久违的、淳朴的踏实感和幸福感。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言:

“因为使人生幸福,不可不爱人生的琐事,灵的光、竹的战栗、雀群的声音、行人的容貌,在所有的日常琐事之中,感着无上的甘露。”

(作者系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平淡生活中的“人间情味”

——读乔叶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

翟晓菲



《要爱具体的人》,乔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新作快评 鲁敏短篇小说《临湖的茶室》,《当代》2024年第6期

珍惜每个泛着微光的珍贵瞬间

杨凯麟

在短篇小说《临湖的茶室》中,鲁敏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情境,将主要角色(一个暴富的商人燕君与他各怀心思的昔日好友们)聚集在临湖的一间茶室内,所有的人对话、心理博弈、行动与情动,被高度凝练在限定的空间内。小说搭建了一个人性的试炼场,在真情与假意之间流转,在对二者判断的摇摆中,最终抵达的混沌与复杂才是小说最真实的内核。

在这篇小说里,鲁敏在当代的语境中实现了一个江湖的复现。在“武林盟主”燕君一个电话召唤下,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群侠”来到临湖的茶室中,他们过去是乘着图书出版的东风而上的从业者,现在都逐渐地被变革的市场所淘汰。东家们在这个江湖中是隐身的,若说江湖众人得以会面有叙事者发力的痕迹,但众人见面后的种种反应和行动却给人自然生长的感觉,这背后是叙事者对笔下人物的尊重和信任,亦融合了对生活细节和人性的观察和捕捉,符合了读者的经验判断。“每个人都是一滴浑浊的水,融在更浑浊的一摊水里。”鲁敏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正是平淡各异的水流如何相融的过程,亦让读者去探究水流之中又都有哪些暗流涌动,他们的目的到底是正义还是为利?义利心理的反复翻转是小说一个隐秘的情感线索。鲁敏

在叙事过程中不停地打破前文所构建的经验,在单方面叙事的前后矛盾中,在叙事和行动的偏差中,不断地推翻此前形成的结论。没有一个立场是单纯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

这场聚会的关键人物燕君的设置很有意思。大病后头脑错乱的他可能是个疯子,也可能是个操纵一切的人。不可靠叙事者的存在促成了小说的叙述性策略,鲁敏将这个叙事陷阱摆在明面上,大大方方地布置着。但随着小说的推进,燕君暴富的真相最终成为小说追求的“麦格芬”(希区柯克最常用的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表示某人或物并不存在,但是却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它成为了一个被愚弄的理念化身,不同的人在对它的追求中自主地建立阐释的链条,组成行动逻辑。小马觉得这可能是大哥对他的忠诚的考验,于是积极地替燕君圆谎;海波则是听出了燕君暴富的“言外之意”,为了好兄弟(也为了潜在的利益)躬身入局;张公在老k的刺激下直接挑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沾老朋友光的;处于婚姻低谷期的芸女士对燕君“嘘寒问暖”。“对这个茶室与燕君的归属关系,根本没人在意或怀疑,就像谁会在意或怀疑太阳挂在天上呢!”燕君可能存在的财富成为了小说的欲望对象,而燕君的言语与现实的